

杨海滨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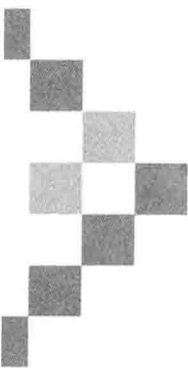
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 市场整合研究

Title A Study of Merchant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云南财经大学前沿研究丛书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 市场整合研究

Title A Study of Merchant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杨海滨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市场整合研究 / 杨海滨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8

(云南财经大学前沿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41 - 4848 - 0

I. ①明… II. ①杨… III. ①商业史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F7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265 号

责任编辑: 范莹

责任校对: 刘欣欣

责任印制: 李鹏



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市场整合研究

杨海滨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1.5 印张 210000 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4848 - 0 定价: 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云南财经大学前沿研究丛书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2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8

一、主要观点 / 10

二、主要特色 / 11

三、本书可预期的创新点 / 12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13

一、基本思路 / 14

二、研究方法 / 15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度量衡标准 / 17

第四节 基本概念及结构 / 22

一、基本概念 / 23

二、本书的结构 / 28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30

第一节 市场整合研究回顾：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视角 / 31

一、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市场整合研究 / 32

二、基于历史学视角的市场整合研究 / 39

第二节 商人组织研究综述 / 40

一、历史上的商人组织变迁 / 42

二、明清时期的商人组织变迁 / 42

第三节 小结 / 45

第三章 明清中国的经济变化与市场整合 / 47

- 第一节 引言 / 47
- 第二节 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变化中的市场分割与整合现象 / 50
 - 一、明清市场发展的诸种特点及其困难 / 51
 - 二、从物价波动看明清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现象 / 58
 - 三、实现明清“整合的市场”的历史条件 / 63
- 第三节 分析明清中国市场整合的基本框架 / 70
 - 一、如何理解明清不同区域市场的整合与分割现象 / 70
 - 二、从商人组织视角解释明清时期市场的分割与整合 / 73
- 第四节 小结 / 76

第四章 明清中国的市场特征与商人组织的经济功能 / 77

- 第一节 引言 / 77
- 第二节 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 / 81
 - 一、商人组织的界定 / 82
 - 二、商人组织在市场整合中的经济功能 / 87
 - 三、若干史料提供的证据 / 94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分割与整合的市场特征 / 97
 - 一、市场网络的作用和特征 / 98
 - 二、商人组织对远程贸易与区域市场整合的影响 / 102
- 第四节 历史的误解：商人组织在市场中的作用 / 105
 - 一、明清江南地区棉纺业的分工和专业化趋势 / 106
 - 二、商人在棉花、棉布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作用 / 108
- 第五节 小结 / 109

第五章 16~19世纪江南地区的市场整合： 以商人组织为中心 / 111

- 第一节 引言 / 111
- 第二节 商人组织、交易成本与贸易：一个简单的两地贸易模型 / 114
 - 一、市场整合的条件 / 115
 - 二、作为不同市场间价格均衡特征的整合 / 117
 - 三、商人套利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 118

目 录

第三节	明清江南地区的市场整合计量分析 /	121
一、	江南米价的长期趋势与商人行为 /	123
二、	计量模型、指标度量与描述性分析 /	131
三、	计量结果及分析 /	138
四、	稳健性检验 /	145
第四节	小结 /	148

第六章 结语 / 150

参考文献	/	156
------	---	-----

后 记	/	176
-----	---	-----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以 16~19 世纪中国的市场发展为对象,对近代中国的商人组织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朝以来,由于中国各主要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规模的跨省域人口迁移,以及弃儒从商成为时尚等经济与社会风气的互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商业^①。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育起来的,使这一时期的贸易总额差不多等于欧洲国家的市场总和^②。现在看来,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变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经济效应,其中一个效应就是,在国内市场取得跨区域远程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原本从事区域贸易的商人团体逐渐成长为专业化的商人组织。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16~18 世纪的商人及其团体在地中海贸易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连接市场的作用^③,以此类推,明清商人组织无疑在中国市场整合的进程中也应当具有相同的功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传统上对明清商人组织的认识还停留在从封建到资产阶级转变的模式上。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入为主地把西方模式视为先进,从而忽略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因此,历来研究者很少论及商人组织在国内贸易中促进市场交换和扩展的重要作用,一般都视之为不符合现代化特征的

① 在 16 世纪,王阳明便有“古者四民异业而通道”的看法,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的人是不分高下的。其后更有李贽、黄宗羲等大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新论点,以肯定商人的行为来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含义。除了这种土商转变的社会影响之外,商人数目增加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中国人口自明初的 7000 万人增加明末的 15000 万人,到清乾隆晚期更增至 30000 万人。但是,同期的举人、进士录取名额却没有增加,据估计,16 世纪每名秀才在 3 年之内只有 1/30 的机会成为举人或贡生。落榜的秀才只好另寻出路,而经商无疑是一个选择,正是这种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层流动造就了“贾而好儒”的徽商等著名商帮。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47 页。

③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01~302 页。

低效率的落后组织^①。此外，从明清中国的历史资料来看，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即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分散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却又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出整合程度非常高的市场化特征。

如何解释明清时期这一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呢？本书认为，如果从商人组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传递和价格变动的影响入手，深入探究商人组织在市场发展中的经济功能，就可以解释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的天平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将要展开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史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组织与市场整合的问题。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学家遵循亚当·斯密创立的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整合和贸易对于经济绩效的重要性，认为这两者的发展将会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并最终通过专业化（技术溢出和扩散）提高生产效率而引致经济增长。除此之外，西方良好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作西方兴起之源^②。然而，由于前工业化时代缺少完整有效的宏观经济数据，目前的经验研究还没有明确回答西方近代市场是如何整合的，以及市场的扩展是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North and B. R. Weingast 1989；S. R. H. Jones, 1993；R. Studer, 2009）。与此相仿，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经济史学家们不但对明清经济增长存在诸多争论，而且对这一时期国内市场整合的研究也颇有争议（吴承明，1996；韦森，2006）。特别是黄宗智（1991）提出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悖论现象以来，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但是其基本理论进路并没有脱离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判断中国过去的历史，而缺少一种用中国历史事实和社会背景来解释其经济进化的视角。

更重要的，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朝前期，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

①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曾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从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19页）。

② 详见 Keller, “Ar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Trade-related?”; Coe and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改变,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平均保持在88%左右^①。因此,学界已对明清长期处于稳态的农业社会现象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却有着很大分歧:以伊懋可(Mark Elvin, 1973)、漆侠(1986)和麦迪森(2008)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在唐宋(特别是宋代)时期达到高峰,技术创新被视作宋代领先于西方的关键,但是由于人口压力、技术创新、科举制度等原因,中国经济从明朝开始长期停滞^②;与之相反的是,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者则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认为明清人口增长率并不比同期西欧高,在技术和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进步,因而明清时期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顶点^③。特别是李伯重对清代隶属松江府的华亭—娄县地区GDP的研究证明,至少在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经济表现并不逊色于同期的荷兰(李伯重,2010)。上述关于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论证表明,如果仅仅停留在总量经济的层面考虑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考察市场环境和经济组织等微观因素,才能对前近代中国经济有深入认识。

我们知道,从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市场整合作为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它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由市场化(marketization)而导致的市场整合,这无疑是经济史中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现象。事实上,很多经济史学家也注意到,明清经济具有自然经济与市场整合合同时出现与长期并存的特点,黄宗智(1991)将其总结为“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悖论现象。这个问题牵涉明清是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论争,以及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

① 参见《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管汉晖、李稻葵,2010)。此外,李伯重对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时期华娄地区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9.6%,而商业比例为12.8%(李伯重,2010)。

② 伊懋可将人口压力视作“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原因,这导致宋以后的技术进步停滞(Elvin 1973);漆侠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其中宋代是第二个“马鞍”中的高峰,在此之后的元代急速下降,从明中叶到清代短暂恢复到宋时水平后就长期呈停滞之势(漆侠,1986,第29页)。此外,麦迪森(Maddison, 2007)和刘光临(Liu, 2005)对宋明时期GDP、国民收入的研究支持了艾德荣(2005)、文贯中(2005)等人的看法,而姚洋(2003)则通过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验证了伊懋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值得一提的是,文贯中尽管同意伊懋可的理论,但同时认为劳动力和技术并不是固定的,并洞见到“通过内生的城市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和制度创新的需求,海外贸易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导致技术和制度创新,这条边界(按指劳动力和技术)可以上移”(文贯中,2006)。

③ 参见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载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8页。

题。近年来随着明清两代区域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前现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由此产生的相关文献日益丰富。对此,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和经济学视角,分别对自然经济和市场整合进行分析:

一是秉持马克思经济历史观,认为明清时期的主体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但是诸多因素(如人口、抑商政策等)限制了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因而整合的市场是否存在尚有疑问(经君健,1987;张彬村,1997;赵凌云,2003;李根蟠,1988,2003)^①;二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些学者同意明清乡村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也有学者坚持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观点,但都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市场的整合和网络化程度比之西欧同期要高得多(赵冈,1986;Kenneth Pomeranz,1988;王国斌,1992;李伯重,1999;李中清,王丰,中译本,2000;许檀,2003);三是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模式出发,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明清乡村集市不但具有市场交易的特征,而且是形成区域市场网络的起点,这对于理解自然经济与市场整合也极具启示作用(Skinner,1965;樊树志,1990;斯波义信,2001)。目前来看,现有研究还仅限于理论探讨,很多所谓引起这一悖论现象的因素实际上只是该现象的具体表现,并没有实证文献检验市场整合与自然经济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没有找到引致此现象的根本性因素。相应地,就明清时期国内的商品市场而言,市场整合研究需要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市场整合的检验,以及影响市场整合或分割的关键因素。

对于市场整合的检验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以清代物价史研究为起点,倾向于经济学含义的分析,并较多运用历史计量学方法探讨中国明清两代乃至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聚焦点在以粮食价格为指标来测定市场整合的程度^②。

① 对传统中国市场是否整合的论争根源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张彬村(1997)从明清市场需求低、交易成本高和寻租发达三个方面,检讨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赵冈(1986)认为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经济产生的基础,加之政府鼓励社会分工的政策,使之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龙登高(1997)则发现明清时期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是促成传统中国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此外,加州学派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同意明清乡村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但都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市场的整合和网络化程度比之西欧同期要高得多(王国斌,1992;李伯重,1999;彭慕兰,2002)。

② 粮食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物价史的研究中占据了极为显要的位置。彭凯翔(2006)认为,“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已经揭示出在前现代化社会中粮食市场的绝对重要性。有关清代物价史特别是粮食市场整合的学术研究状况,可参看岸本美绪和陈春声所做的文献综述(陈春声,1992;岸本美绪,1997)。

值得一提的是,这方面的定量研究也间接促成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粮价数据集的逐步完善。王业键(Wang Yeh-chien, 1972)、全汉昇和 Kraus (Chuan and Kraus, 1975)、陈春声(1984)和李明珠(Lillian M. Li, 2000)等学者从粮价资料本身的定量分析入手,对市场功能、政府价格政策以及长距离贸易对粮价波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基本确定清代存在着区域市场的整合,并且省内市场价格波动的相关性很高^①。而美国学者 Wolfgang Keller 和薛华(Carol H. Shiue)则采取了中国与西欧进行长时段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西欧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市场发展状况,特别是17~19世纪的粮食市场进行了分析,认为1780年前的中国市场整合程度至少在粮食市场上同欧洲不相上下。不过,Keller和薛华也指出,考虑到19世纪初期,欧洲市场的整合程度较中国更高,就此意义而言,似乎可以认为市场整合是经济增长的后果而不是原因(W. Keller and C. H. Shiue, 2007)。

对于影响市场整合或分割的关键因素问题,研究者主要受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学者施坚雅宏观区域理论的影响^②,大多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探索近代以来跨省经济区域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引致市场整合的各种因素。许檀(2000)通过对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研究,发现迟至乾隆一道光年间,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将各经济区域联结为整体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体系由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与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构成,而政府海禁政策的开放^③,对牙行、税收等制度的整顿,以及长江、大运河、沿海三条商品流通线路等因素对市场网络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李伯重(2010)则认为

① 正如岸本美绪(1997)和吴承明(2001)分别提到的,在这些早期研究中,尤以王国斌(R. Bin Wong)和濮德培(Perdue)对湖南18世纪粮食市场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理解清代市场整合与自然经济并存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 Bin Wong, Perdue, 1988)。

②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F. Braudel, 1993)早就注意到,由于商品交换的局限,市场经济往往具有区域性,而区域(民族)市场的整合与分割同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分工导致的地理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认为集市、店铺、商贩等贸易形式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的,并不能改变经济要素的配置;而高级形式的市场贸易,如交易会、交易所等,则能够改变区域商品与经济要素的流动(F. Braudel, 1997)。施坚雅(Skinner, 1998)对此的观点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稳定性,使得很多地区市场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发育成熟,并且,市场分布和交易行为的变化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李伯重(2010)也指出,明清区域市场和经济区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施坚雅理论所说的共同特征。鉴于施氏理论的重要性和启发性,可以进一步研读:有关施坚雅发展其理论框架的5篇重要论文收录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而对其理论的批评综述可参看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89)。

③ 清政府在1683年收复台湾之前一直施行禁海政策,全面禁止沿海贸易。

在工业化之前,明清时期的水运系统对区域市场和经济区的功能整合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市场。此外,龙登高和张海英在继承傅衣凌、吴承明、刘石吉和樊树志等学者市场研究的基础上^①,对明清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主体的区域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而认为明清乡村集市不但具有市场交易的特征,而且是形成区域市场网络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显示区域贸易和专业化市镇的成长是促成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龙登高,1997;张海英,2002)。

上述两条研究线索表明,尽管市场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萧条^②,但各区域市场的整合程度非常明显,而且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然而,正如吴承明(2001)所指出的,学界对市场整合的分析“虽可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未免实证不足,故应慎重”。事实上,现有研究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由于在检验市场整合时主要采用相关分析法,这种静态分析方法具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得出的结论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陈春声使用相关分析法对1750~1769年岭南地区(含广东十三府州和广西五府)的米价方差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相关系数为0.631(陈春声,1992)^③,而马立博(Robert Marks)对1738~1769年两广25个府州米价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则为0.67(Marks, 1992)。尽管陈春声将出现这么高的相关系数归于材料可比性方面的问题,但由于陈、马两人使用的数据来自清乾隆时期地方官员呈报的粮价单,侯扬方因而质疑粮价单本身未必可靠,加之将所用粮价按年平均后,掩盖了粮食的季节差价,结果导致相关系数偏高(侯扬方,1996)。事实上,得到较高的相关系数还可能是由于政府的价格干预,或者由通胀、季节性等引起的共同趋势在计算中未加处理等其他因素引起的^④。

其次,一般认为任何影响产品在市场间的流通,或影响产品在不同市场上

① 详细分析可参见以下各书: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按照吴承明和岸本美绪的研究,这三次市场萧条分别发生于17世纪30年明代末期,17世纪后期清代康熙年间,以及19世纪初叶的道光年间(吴承明,2001)。

③ 陈春声(1992)还认为这一结果至少表明,“就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而言,18世纪的广东并不比同时代的法国逊色”。

④ 相关研究表明(周章跃、万广华,1999),尽管在同一区域市场的价格序列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但这些市场间并不存在整合关系。同样地,尽管较低的相关系数通常意味着市场间可能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整合关系,但这些市场也有可能是整合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某市场既是重要的供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中心(Blyn, 1973);使用非同种同质产品的价格资料(Harriss, 1979);不同时期的成本变动(如运输费用变动)(Wyeth, 1992)。

的价格水平的因素均会影响市场整合水平，而运输条件、政府干预和价格信息也因此被视作影响市场整合水平的三个主要因素^①。但是，由于明清中国是一个拥有广大内陆，区域间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复杂多样，并且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人口、气候、战争灾害、地理和交通运输等外生性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明清发达的经济体，比如江南地区也会一方面存在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整合程度很高的市场？^②例如，清朝自太平天国战乱前后，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征收2%~10%的厘金（罗玉东，1936），这种跨地区重复对贸易征税的制度使市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客观上造成了市场的分割加剧。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却显示，1740~1910年以苏州为枢纽的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很高（王业键，1992；卢峰，彭凯翔，2005），这一史实如果仅用苏州地区的交通条件和地理因素利于市场整合来解释，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考之同期的广东与湖南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并不高（彭凯翔，2006）。

上述两个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明清市场整合的分析除了实证研究需要方法上的改进外，还有必要提供更丰富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此外，在解释明清分散的自然经济与市场整合并存现象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经济组织在明清市场整合中的作用。揭示明清存在“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现象的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1991）认为从市场商品化出发，研究作为传统和近代市场交接点的商人组织，可以找到自然经济和 market 整合的运行机制^③。滨下武志发现在16~19世纪东亚的区域白银贸易中，由于在市场和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商人网络，使得市场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降低，并保证企业间契约行为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相互转换”（滨下武

① 兰德斯（Landes，2001）和萨克森（Sachs，2001）等人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Roman Studer（2009）据此研究发现，在解释西欧早期市场的整合因素中，地理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陆铭、陈钊（2006）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地理和政策。但是，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因为Rodrik（2004）等人的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在市场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② 王国斌、濮德培（1992）曾经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描述为“对清代农村孤立的和‘自然经济’的强烈印象，最终会在活跃的整合的市场面前放弃，但是，鉴于在出口地带之外还有未被市场整合触及的地区存在，任何把清代视为市场社会的意象都是不全面的”[原出 R. Bin Wang 和 Peter C. Perdue（1992），转引自吴承明（2001）]。

③ 与此相仿，希克斯在研究16世纪市场的兴起时，发现伴随着“专业商人”的出现，导致了西欧出现“市场渗透”并在18世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详见希克斯（John R. Hicks）的《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与中国传统市场中个体小农的作用突出不同，希克斯指出，在中世纪西欧，“事实从来就是，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或非完全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物，而是商人及后来金融家的产物。”（《经济史理论》）。

志, 2008)。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历史的制度分析视角触及明清商人组织在市场整合中的作用(邱澎生, 1995; 张东刚, 2000; 刘建生, 刘鹏生, 燕红忠, 2005)。无疑地, 这些研究可以启发我们思考, 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制度变迁进程中, 商人组织除了旨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之外, 还会对市场的整合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明清中国存在着由市场化而导致的市场整合与自然经济的“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那么, 商人组织将可能作为影响这种经济变迁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选题意义

长期以来, 在面对中国历史中的一些经济现象时, 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经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异, 许多国外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对明清中国经济表达了类似的困惑。比如, 亚当·斯密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在 18 世纪后期会停滞, 以及中国为什么不重视对外贸易所抱有的疑问: “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是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 都不鼓励对外国的贸易, 似乎全都从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亚当·斯密, 2001), 以及“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 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 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 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 与现今旅行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 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达到的最充分的富裕程度”(亚当·斯密, 2001)。从斯密关于前近代中国的这些疑问中, 无论如何都不免会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① 一些经济学家也注意到, 尽管中国在古代经历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的发展, 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革命趋势, 但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中国一直到近代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基于贵金属的货币体系, 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甚至开始走入停滞的困境(希克斯, 1986; 塔洛克, 1999)。这些困惑都促使经济学家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历史进程的逆转呢?

上述经济学家的疑问表明, 传统中国经济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具有某些不同

^① 除此之外, 李约瑟还有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魄力的皇帝都对豪强地主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就好像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激励一样?”的疑问(李约瑟, 1986)。

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特征，这种差异使中外学者在面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各出机杼，由此而来的解释就显得众说纷纭而极具启发性。比如，Dimond（1999）认为是中央集权的非竞争性和税收特征导致明清中国的停滞；伊懋可（Elvin，1973）则认为停滞的原因是高水平陷阱，其他有影响的解释还有：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亚当·斯密，2001；黄仁宇，1997）、科学主义、理性思维的缺乏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李约瑟，1986；Dimond，1999；林毅夫，2007）、寻租论（塔洛克，1999）。不可否认，现有的这些观点尽管可以对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提供某一个方面的答案，但还没有厘清众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形成一個内在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事实上，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明清中国会一方面存在着落后、分散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形成区域性的整合市场？相信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能很好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中的稳定与变迁，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16~19世纪时期，由于中国交通条件改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使得这一时期的跨区域远程贸易极为活跃，并形成了江南、珠三角、长江上中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济区。此外，随着美洲白银的大规模输入，明清中国不仅正在逐步形成国内经济联系紧密的市场，而且对外贸易的急速增长以及物价波动也已经与世界经济产生联动关系^①。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认为，这些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与当时的市场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她曾经形象地把前近代中国的市场结构称为“通过水路连接、有落差的小蓄水池群”，群中的每一个下级蓄水池都要依赖上一级蓄水池的供水，这就使从上一级蓄水池时刻供给的水（货币）显得尤为重要（岸本美绪，2010）。按照这一个生动的譬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蓄水池中，最大的水源来自对外贸易流入的大量白银，同时，国家财政也从各个蓄水池中抽取水，然后通过消费排放出去，周而复始。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果水源断绝，或者水不断外流时，国家经济将面临极大威胁；二是各个同级蓄水池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不畅通，甚至各自拥有独立的水龙头时，国家将失去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按照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发育情况来看，还有很多地区的经济联系处于割据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上述五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内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市场整合。一直以来，这种市场分割与整合并存的经济现象困扰了经济史学家很

^① 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释》，选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选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1年版。

多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其实，如果忽略企业家和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就会很容易地迷失在经济变迁的表象之中。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争论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还是全汉昇提出的“物价革命”抑或商业革命^①，市场的发展无疑都需要企业家及其组织的推动，而明清时期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为中国商人的兴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环境。因此，本书认为，有必要从市场主体，特别是商人组织的角度重新认识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也是本书研究的着力点和出发点。

因此，本书将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问题，实证考察商人组织在扩大市场交换和商品化中的作用机制。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经验中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的收敛提供历史证据，这对于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内涵和传统经济组织变迁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主要观点

一个有效的现代化市场除了供需双方的参与，还需要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它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完成，而是一个渐进趋向均衡的过程，这在明清两代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本书研究中，我们从商人组织的角度探讨其对明清市场整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并将经济组织纳入市场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中，强调经济学对经济史的回归，并形成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首先，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可以从市场发展角度得到解释。由于将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定性为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种观点长期影响着经济史的研究范式。不过，这一认识在近年来有所改变，黄宗智（1991）就指出明清同时存在“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悖论现象。尽管学界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这也表明市场发展在前近代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事实上，明清经济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了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明清存在的市场分割与整合现象。

其次，明清时期商人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市场制度的变迁。在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国内外远距离贸易的不断发展，商人资本及其组织开始在社会经济

^①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6页。